

Reflections on
**MODERN
CONTINENTAL
PHILOSOPHY**

现代欧陆哲学散论

季广茂 / 著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现代欧陆哲学散论

季广茂 著

Reflections on
MODERN
CONTINENTAL
PHILOSOPHY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现代欧陆哲学散论 / 季广茂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6.2

ISBN 978-7-5155-0935-8

I. ①现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现代哲学—欧洲—文集
IV. ①B50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28011 号

现代欧陆哲学散论

作 者 季广茂
总 策 划 王吉胜
责任编辑 陈珊珊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260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0935-8
定 价 45.00 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
邮编: 100102
发 行 部 (010)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64222699
总 编 室 (010)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64970501

目录 | Contents

欧美哲学之异同	/001
启蒙运动的性质与使命	/009
倒行逆施：反启蒙运动的先驱	/028
法国梦寻：从祛魅到复魅	/043
极端反智主义的狰狞	/061
苍白无力的“解构”	/072
萨特哲学的解放性效果	/082
胡塞尔纯粹现象学解读	/096
科学探究与人文阐释：精神分析的二元性	/130
精神创伤及其叙事	/145
精神分析的社会之维与文化之维	/160
且看齐泽克如何看拉康	/183
哲学阅读快感的回归	/227
视差之中见乾坤	/240
哲学的深奥与人生的浅薄	/272
后 记	/294

欧美哲学之异同

一

我从事的专业虽然与哲学常有交叉，但对哲学，一直是敬鬼神而远之。至于原因，一是哲学“名头甚响”，有“科学之母”“科学皇后”“科学之科学”之称。但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它研究的都是总体性、基础性的大问题，凡与“生存”（existence）、“知识”（knowledge）、“价值”（value）、“理性”（reason）、“心灵”（mind）和“语言”（language）相关的问题，毫不客气地尽入彀中。除此之外，它处理这些“宏大叙事”的方式同样令人心生敬畏：以批判和系统性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，而且对理性思辨情有独钟。

我觉得任何学问之为学问，第一个要件是好玩，否则一切免谈。哲学显然是一门学问，但不好玩。不仅不好玩，而且没有用。说到用处，肯定有人不以为然，肯定会迅速联想到王小波对“用”的讥讽。据王小波考证：“当年欧几里得讲几何学，有学生发问道，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？欧几里得叫奴隶给他一块钱，还讽刺他道，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！”欧几里得毕竟还有奴隶可用，随手就能拿出一块钱来（想来在古希腊，一块钱还是颇能买几个油条大饼的），可以不必在乎学问

有没有好处。但碰上那些不仅无奴隶可用，还因为饥饿无“脑力”可用的主儿，“学问”的好处还是要问一问的。哪怕是“无用之用”，也是一“用”吧，何况还有人认为“无用之用，是为大用”呢？

齐泽克让我明白，哲学不但好玩，而且有用。

我一直觉得，哲学是哲学家们的“紫禁城”，他们躲在那里自说自话。只有那些不切实际、好高骛远的人，才会乐此不疲地从事这个行当。像我这样的门外汉难入其境，更不明其妙。

似乎哲学也有其用处。但细究起来，这样的“用处”其实是没有什么“用处”的。自笛卡尔以来，哲学成了指导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原则。比如，我们凭直觉相信，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之中。但问题马上来了：真的存在什么“物质世界”吗？我们怎么知道真的存在这样的“物质世界”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“物质世界”之中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：我们并没有生活在“物质世界”之中，而是生活在某人虚无缥缈的梦中（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称为“上帝”）？我们要想活得长久，就必须祷告上帝，愿他“长眠不要醒”；什么时候，他老人家一觉醒来，我们全都呜呼哀哉？面对这样的问题，笛卡尔的办法甚是简单，他要反问一句：究竟谁在问这个问题？答案当然是“我”。于是就有了“我思故我在”的名言。这个过程就是哲学思考的过程。哲学的用处就在这里。

其实，仔细想一想，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，因为这样的“哲学思考”不要也罢。在“存在”还是“不存在”的问题上，我们的选择只有一种，那就是“存在”，因为我们无法设法“不存在”。也就是说，除了相信我们是存在的，我们没有其他选项。大卫·休谟（David Hume）说过，我们首先是人，然后才能做哲学家。一旦做了哲学家，我们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人，岂不是庸人自扰，多此一举？

可见，以哲学为人生和学问的前提、根基，既不靠谱，亦属多余。

我们的基本信仰与“哲学反思”没有什么关系，它不需要通过“哲学反思”使自己合法化。理查德·罗蒂（Richard Rorty）和阿尔文·普兰丁格（Alvin Plantinga）都曾经说过，这样的“基本信仰”不仅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信仰，还包括伦理学、政治学和宗教方面的信仰。罗蒂就坚定地认为，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与哲学无关，它不需要以哲学为前提，由哲学来支撑，这就是他所谓的“民主对哲学的优先性”。

有人认为哲学的用处在于“知识维护”，而“知识维护”主要是通过哲学思辨完成的。这话有几分道理。比如，基督徒总是为“恶”的问题所苦。他们相信，上帝不仅创造了“善”还创造了“恶”。问题在于：为什么？信奉这样的上帝还有什么意义？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，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人生无意义。这时，“宗教哲学”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它一直热衷于探讨此类问题。同样，无神论者之所以为无神论者，是他们觉得，有关上帝是否存在的所有论争都是自寻烦恼。但是，如果他们有机会深入了解与“大爆炸”理论相关的知识，形成了全新的“宇宙图绘”或“宇宙景观”，那么，无论他们的信仰多么坚定，都会思考“无神论”究竟对他们意味着什么。他们难免要问：“宇宙”作为一个名词，究竟属于单数名词还是复数名词？换言之，究竟存在着多少宇宙？如果存在多个宇宙，各个宇宙之间是否存在沟通的可能？宇宙真的是“客观”存在？有没有可能，宇宙只是一张全息照片之类的东西？除非无神论者彻底关闭心扉，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。无论是有神还是无神，一旦认真思考，哲学似乎就是必不可少的。

说到“信”，尤其如此。我们必须有所“信”，否则一天也过不下去。进餐厅吃饭，我们必须相信食品是安全的；进商场购物，我们必须小心翼翼，因为陷阱无处不在，但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小心行事，买到货真价实的商品还是完全可能的；乘飞机远行，我们必须相信，飞机还

是安全的，失事的概率很低。有人主张“怀疑一切”，即使必要，也是根本做不到的。凡事怀疑，寸步难行，属于“病态”的怀疑，要看心理医生的。癔症式怀疑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。那些违反常识的，那些看似奇迹的，倒大可怀疑一下，免得被人欺骗，还帮人家数钱。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不愿意相信常识，都乐意相信“奇迹”，结果吃亏上当，苦不堪言。

我们坚持自己的信仰，但不能不顾及反对我们的信仰的各种看法。我们相信什么？我们相信的东西是否值得我们相信？我们如此相信下去，会导致怎样的结果？我们相信生命无价，更不会平白无故地害人性命，但这是否意味着，一旦我们成了军事指挥官，不会下令轰炸敌军阵地，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伤及无辜？西方人相信民主选举至关重要，但是，如果有一个疯狂反对民主选举的政党也要通过选举执掌国家政权，而且他们很清楚，一旦这个政党上台，它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选举，永远执政，他们还会像当初那样坚信民主选举至关重要吗？是否要给民主选举增加某些限制条件（比如反对民主选举制度的政党不得参加选举）？如此做派是否多少动摇了他们的信仰？

回答这些问题需要“哲学头脑”。这样的“哲学头脑”要拥有众多哲学本领。概念的区分就是其中之一。而这正是我们的弱项。同样是“黑”，我们分不清“black”与“dark”。同样是作者，我们分不清“writer”与“author”。与人争论，我们分不清“事实”“意见”与“逻辑”。要把某些概念区分开来，哲学是必不可少的。比如，同样是错误的行为，有些行为错误，是因为这些行为本身是错误的，如肆意杀人。有些行为错误，是因为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是错误的，如对死刑犯执行死刑，但杀错了人。比如，要搞清“恶”的问题，就必须把“无缘无故的恶”（*gratuitous evil*）与“有缘有故的恶”（*non-gratuitous evil*）区分

开来。说到自由意志，就必须把自愿选择与被迫选择区分开来。

哲学的用处远远不止于此。哲学不但是思考问题的工具，而且是解剖现实的利器。用齐泽克的话说，它敢于面对“实在界这个大荒漠”。它不再是“象牙塔”中的奇思妙想。它能一刀一刀解剖残酷的现实，使我们面对残酷的人生。它能把极高深的哲学思索与极琐碎的日常生活密切结合起来。以哲学透彻生活，以生活丰富哲学，相得益彰，令人眼界大开。它的好玩在于，无论现实和人生多么残酷，它都能生动活泼；无论描形状物，还是理论解剖，都能惟妙惟肖，生动可观。

二

齐泽克还让我领略了“欧陆哲学”之妙。齐泽克虽在美欧众多大学及研究机构担任客座教授，但一直以“欧陆哲学家和批判理论家”自居。他深受黑格尔主义、马克思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。本人不才，只对美国哲学略知一二，对欧陆哲学所知甚少。

众所周知，在美国大学的哲学系中，号称专门研究形而上学的专家不在少数。按欧陆哲学的标准，“存在”（being）与“时间”（time）是形而上学的两翼。这方面的泰斗当然是大名鼎鼎的海德格尔，其著作《存在与时间》（*Being and Time*）自然令很多人“高山仰止”，但也令很多人苦不堪言。无论海德格尔如何威武，无论《存在与时间》多么重要，在美国专门研究形而上学的教授中，几乎没人真正拿它当回事。

何以至此？有人以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为释：美国专门研究形而上学的专家属于分析哲学家之列，海德格尔则是欧陆哲学家。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，大有楚河汉界之势。两者倘若没有交集，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，倒也相安无事，颇有“美者自美，吾不知其美也；恶者自恶，吾不知其恶也”的乐趣；可一旦交集起来，情

形自然大不相同。代表欧陆哲学的雅克·德里达（Jacques Derrida）与代表分析哲学的约翰·塞尔（John Searle）曾经展开论战。论战的结果是，塞尔直斥德里达宣扬“蒙昧主义”（obscurantism），德里达则讥讽塞尔“浅薄可笑”（superficiality）。

把哲学分成“欧陆哲学”和“分析哲学”，虽然亦属“约定俗成”之举，但细究起来，还是觉得颇为可笑，颇有可议之处。“欧陆哲学”冠以地域，表明这种哲学成长于欧洲大陆，特别是德国和法国；“分析哲学”独标方法，表明它以概念解析见长。把两者并列，如同把“北京烤鸭”与“啤酒鸭”作等量齐观。不亲自品尝，还真不知谁优谁劣。

尽管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内部也是学派林立，形态不一，但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还是存在着重大差异。一方面，它们都很重视“经验”（experience）与“理性”（reason）；另一方面，对“经验”与“理性”的体验又呈南辕北辙之势。一般说来，分析哲学求助于经验，但又把经验理解为常识性的直觉，把理性理解为进行逻辑推理、理性思维或分析判断的能力。

欧陆哲学则不同。先说经验。在它看来，经验不同于常识性的直觉，也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实验。它处于常识性的直觉和科学实验之下，自成一域，难以触及。胡塞尔、海德格尔、萨特、梅洛-庞蒂等人把这种经验说成“具体的”“活生生”的经验。与这种经验相比，日常经验和科学实验实在是肤浅、虚妄，苍白无力，不堪一击。这样的经验与新康德主义推崇的“超验意识”（transcendental consciousness）或“绝对意识”（absolute consciousness）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没有“超验意识”和“绝对意识”的支撑，我们的日常经验毫无意义。

再说理性。欧陆哲学承认，理性是人类的重要活动之一，是人类之为人类的标志。但它并不认为理性与逻辑推理有什么关系。在它看来，

理性并不属于逻辑学的领域，而是对知性想象（intellectual imagination）的创造性运用。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，包括福科、德里达、德勒兹等人在内的法国哲学家多持此类见解。

欧陆哲学还认为，不但分析哲学家理解的“经验”和“理性”浅薄幼稚，而且分析哲学家只能理解这些概念所蕴含的东西，他们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，而这些概念充其量也只是哲学思考的第一步。分析哲学家无法完成存在主义的哲学使命，即超越这些概念，触及生命的幽昧之处，探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。

由此观之，即使欧陆哲学也有自己的经验哲学，那也与分析哲学的经验哲学大相径庭。它相信，哲学不仅要超越日常经验和科学实验，还要超越“经验”这一概念，探寻隐藏在“经验”这一概念之下的意义。要想做到这一点，究竟需要哪些条件？这是欧陆哲学中的经验哲学长期思考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欧陆哲学中的想象哲学要回答的问题是：如何超越这些概念，思考那些本来无从思考的事物，回答那些本来无从回答的问题？“无从思考的事物”和“无从回答的问题”的核心是“无”，由此形成的哲学自然是“无”之哲学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是一母同胞，经验哲学与想象哲学亦不乏紧张态势。一般言之，经验是有其直觉确定性（intuitive certainties）的。这本来是经验的长处，现在成了对创造性“知性想象”的限制，当然要接受创造性“知性想象”的挑战。福科曾经谈到，知识（knowledge）是有其限制的，知识也不想超越其限制，因此它知道自己的边界何在，并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边界；批判（critique）则不同，它要尽其可能超越对知识的限制，而不是墨守成规。前者显然属于欧洲哲学中的经验哲学领域，后者显然属于想象哲学的范畴。在这里，经验哲学与想象哲学的对峙一望便知。许多法国哲学家，包括列维纳斯、科利尔、

巴迪欧在内努力调和两者间的矛盾，把现象学经验（phenomenological experience）与解构性创造（deconstructive creativity）融为一体。

阅读分析哲学著作并不困难，阅读欧陆哲学著作却甚为不易。前者清晰透彻，后者艰深晦涩。分析哲学家大多对读者“心怀善念”，以读者为取向（reader-oriented），写作平易近人，读来轻松自如，因此常常成为介绍其他哲学（包括欧陆哲学）的最佳“二传手”。无论多么艰深的哲学著作，一经美国分析哲学家之手，必定成为清晰条理的脍炙人口之作。在这方面，欧陆哲学不但“不为”，而且“不能”。你可以用威拉德·蒯因、约翰·罗尔斯和索尔·克里普克的语言和笔触，得心应手、游刃有余地介绍海德格尔、德里达和德勒兹的著作，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分析哲学可谓哲学的“通用之语”（lingua franca）。绕道美国，借助于分析哲学家之手了解欧陆哲学，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哲学“丝绸之道”。

启蒙运动的性质与使命

一、启蒙运动的性质

“启蒙运动”一词的使用甚是混乱，不同的人常常赋予它不同的内涵。在很多人看来，它是现代性之源，既派生了自由主义的宪法，又导致了使人异化的技术。形形色色的团体和政党打着它的旗号招摇过市，为其行为或政策辩解。2005年，丹麦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幅漫画，不仅引起激烈的辩论，还引起了骚乱。反对这幅漫画的人称发表这幅漫画违背了启蒙运动倡导的价值观——待人“宽容”和对少数人的尊重，拥护发表这幅漫画的人称反对者的做法违背了启蒙运动倡导的理念——新闻自由和自我表达的权利。究竟何谓“启蒙运动”？它是一个历史阶段、一场知识运动、一个思想潮流、一种文化精神、一套价值观念，甚至一个心理框架、一套文化成就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，不同的反启蒙者勾勒了它的不同方面。概而言之，它包括四个方面。

第一，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样，启蒙运动首先是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高度引人注目的历史时代。这样的历史时代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。在这个时期，科学、哲学、社会和政治均发生了天翻地覆之变，中世纪的世界观被一扫而光，现代西方世界终于降临。启蒙运动在法国

大革命时达到顶峰。法国大革命时期，传统的等级森严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（法国的君主制、贵族特权、天主教权威）等一切根深蒂固的确定性（certainties）均被彻底摧毁，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取而代之。英语世界称之为“理性的时代”（Age of Reason）、“探索的时代”（Age of Exploration），德语世界称之为“批判的时代”（Zeitalter der Kritik），法语世界称之为“光明的时代”（l'âge de Lumière）、“哲学的时代”（l'âge philosophique）、“人的世纪”（le siècle de l'humanité）和“仁慈的世纪”（le siècle de la bienfaisance），等等。总之，启蒙运动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性的诞生。

一般认为，启蒙运动出现的大致时间是整个18世纪，但具体而言，又有几种不同的说法。（1）1668—1776年，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（Glorious Revolution），止于美国宣告独立；（2）1668—1789年，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，止于法国大革命；（3）1668—1815年，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，止于法军战败，拿破仑再次退位并被流放，同时也是浪漫派崛起之时；（4）1668—1900年，即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，中经马克思，止于尼采辞世。某些历史学家，把18世纪视为现代史的肇始。依据这种看法，文艺复兴强调的个人主义，宗教改革重视的宽容忍让，美洲新大陆及东方的发现，17世纪的科技进步，统统只是启蒙运动的“预演”或“前奏”，全都没有导致重大的社会、文化和政治变革。只是到了18世纪，才真正出现了这样的变革。启蒙运动的非凡意义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第二，启蒙运动是一场高度自觉、诉求明确、席卷欧洲、波及全球的运动。我们把“The Enlightenment”译为“启蒙运动”就是强调它的这一维度。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“运动”，就是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。启蒙运动产生的影响，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不可相提并论

的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要么只是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（文艺和宗教），只是影响了某些人的生活（艺术家和宗教信徒），启蒙运动则使整个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之变。

我们中国人强调启蒙运动是文化运动（cultural movement），西方人多强调启蒙运动是知识运动（intellectual movement）。如此一来，理解启蒙运动就是理解启蒙运动的知识史。卡西勒（Ernst Cassirer）认为，启蒙运动“是整个知识发展的一部分或一个特殊阶段，现代哲学思想由此获得了特有的自信和自觉”，精神也“在理解自身的性质和命运方面，在理解自身的基本特性和使命方面变得明晰和深刻。”^[1] 启蒙运动的知识首先是有关人的知识，人的知识的终极目的，在于“人类心灵的历史进化”（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human being）。这样的知识又称“人学”（science of man）。建立人学的目的在于证明，存在着普遍的人的一致性（universal human identity）。这为后来的民族主义者所诟病。

第三，启蒙运动是由一套扩散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特定观念促成的思想潮流。这些观念叠彩纷呈，是众多观念组成的混合物。尽管如此，启蒙运动有其共同一致的概念、方法、价值观念和改革方案。就其观念而论，它基本上是一套社会哲学（social philosophy），始于改革社会的理想，终于社会改革的目的，有其社会前提（social premisses），有其社会目的（social ends），同时把宗教和艺术纳入社会改革的坐标之上，凡事以社会改革论之。作为一种社会哲学，它对人性与社会有共同的基本假定。它研究支配自然和社会的法则，并为这些研究奠定了共同的方法论

[1] Ernst Cassirer, *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* (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51), tr. F.C.A. Koellin & J.P. Pettegrove, p.vi. "It forms but a part and a special phase of that whol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rough which modern philosophic thought gained its characteristic self-confidence and self-consciousness...achieves clarity and depth in its understanding of its own nature and destiny, and of its own fundamental character and mission."

根基，同时制定社会改革的方针大计。

启蒙运动的观念范围广泛，差异甚大，绝非铁板一块，其中既有旧观念的延续，又有新观念的创生；有古典主义的情怀，又有浪漫主义的冲击力；有一味求新的“唯新主义”，也有乡愁浓郁的“原始主义”。但启蒙运动影响深远，其观念、理想、渴望、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议，在西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在中国经历了多次“救亡”之后，至今绵延不绝，甚至高入云天。

第四，启蒙运动是特定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文化精神。启蒙运动重视理性，启蒙哲人被称为“理性党”（Party of Reason）。启蒙哲人相信人类的能力（ability）和能量（capacity），而人类的能力源于其智力（intellectual power）。这些东西归在一起，被称为“理性”（reason）。借助于理性，人类能够获得有关自然的系统知识，并把这种知识作为实际生活的权威指南。因而，有了理性，人类就有了理解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。人类要想自我保存和延续生命，这种能力是必不可少的。权威是盲目的，因而是非理性的，启蒙运动当然与之不共戴天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启蒙运动思想家是“一元论者”，绝对不讲什么宽容：他们相信人类的能力、能量、智力和知识，并以之为权威，同时对其他形式的权威（如传统、迷信、成见、神话和奇迹等）表示怀疑，甚至充满敌意，只要这些形式的权威要与理性的权威抗衡。正因为如此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往往与官定宗教（established religion）势不两立，因为两者的主张针锋相对。人一旦摆脱了自愿接受的不成熟状态，一旦敢于独立思考，敢于运用自己的智力，在思考和行动时自我指引，那么官定宗教就会成为“多余”，会被弃之如敝屣。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遭到宗教的反对，自然可能结为仇寇。启蒙哲人相信，人一旦被启蒙运动，就会最终改善自己的存在状况。理性是教条、迷信、虚假社会权威的解毒剂。

启蒙运动是一场旨在推进社会变革的“圣像破坏运动”(iconoclastic movement), 它要打破旧观念、旧方法、旧习惯和旧权威。据达朗贝尔为《百科全书》撰写的《序言》, 启蒙运动实现了启蒙运动之前的渴望。所谓启蒙运动之前, 实指古希腊、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三个时期。在达朗贝尔看来, 古希腊的观念是由诸如古罗马时代著名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如塞内加(Lucius Annaeus Seneca)和古罗马著名诗人维吉尔(Vergil)这样的拉丁文作者支撑的。古希腊的观念对18世纪的思想影响至深。诚实、古老的形而上学——如霍布斯所谓的“亚里士多德性”(Aristotelity)——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但启蒙运动依然延续着古希腊的观念, 甚至可以是对古希腊观念的发挥光大。这包括柏拉图的“爱欲”(Eros)观和“至善至美”(kalokagathia)观^[1], 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, 包括斯多葛派的人类学和伦理学, 包括普罗塔哥拉(Protagoras)的人本主义, 包括普鲁塔克(Plutarch)的国家观和自由观。

不过, 对古希腊的态度, 启蒙运动显然不同于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新古典主义。文艺复兴对古希腊的态度是“高山仰止”, 因而欲仿效之; 启蒙运动回响着古希腊的观念, 却并不对此大肆张扬, 更不存在模仿问题。“古今之争”(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)最能说明问题, 它一方面展示了古希腊艺术的魅力, 肯定了其价值, 但又以近乎苛刻的标准, 对其内在价值作出批判性的评估。其他人则在古希腊的艺术和思想中找到了避难所, 把它当成了表达对当时社会的不满的武器。在整个启蒙运动时期, 专门研究古希腊史和古罗马史的著作一直都在出版, 从未中断, 是古代世界在当时的复活。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, 启蒙运动使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彻底的结构性的变化。自此之后, 人们

[1] 柏拉图认为, 美(Kalos)和善(Agatōs)不可分割, 美即善, 善即美, “kalokagathia”(至善至美)把“美”和“善”两词拼在了一起。